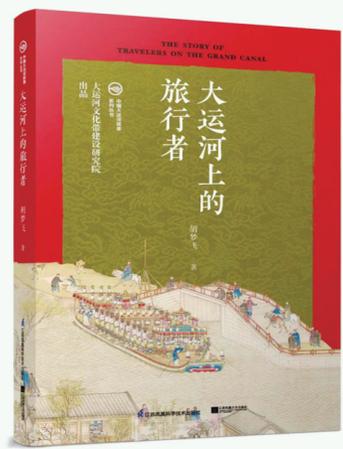


# 与大运河研究的新范式 《大运河上的旅行者》

流动的文明史·

■ 吴金甲



的社交图谱,展示了信息如何沿运河传播,人情网络如何通过运河维系,文化资本如何借助运河流动。这一分析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流动性与连通性的理解。

## 三、旅行体验的多元维度与大运河的文化建构

《大运河上的旅行者》对旅行者体验的深入分析,构成了该书的又一学术亮点。作者不仅关注旅行者的外在行为,更致力于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通过对旅行者的情感表达、身体感受和审美体验的分析,揭示了大运河旅行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作者注意到,大运河旅行既是一种空间移动,也是一种时间体验。旅行者沿运河行进,不仅跨越了地理空间,也在经历一种历史的穿越。运河沿岸的历史遗迹、人文景观唤起了旅行者的历史意识,激发了他们的怀古之情。这种时空交错的旅行体验,在文人旅行者的诗文中得到了尤为充分的表达。作者通过对这些诗文的细致解读,揭示了运河旅行如何成为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人与历史的文化实践。

同时,作者还关注了旅行者的身体体验与运河旅行的物质维度。他详细描述了运河旅行的各种不便与危险——船只的拥挤、天气的变幻、疾病的威胁、盗匪的风险等,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则构成了旅行者日常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些物质层面的分析,作者打破了我们对大运河旅行的浪漫想象,还原了其真实的历史面貌,使大运河历史研究更加贴近生活、贴近人性。

更为深刻的是,作者通过对旅行者书写实践的分析,揭示了大运河如何被不同时代的旅行者不断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义。每个时代的旅行者都带着自己的文化预设和期待视野来看待大运河,他们的记述不仅反映了大运河的客观状况,也参与了运河文化意义的建构。作者以其敏锐的文本分析能力,揭示了旅行记述背后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技巧,展示了文字如何塑造现实,书写如何建构记忆。这一分析将大运河研究从单纯的历史重构提升到了文化建构与记忆研究的理论高度。

## 四、跨文化视野与大运河的全球史意义

《大运河上的旅行者》还以其开阔的跨文化视野,将大运河研究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之中。作者特别关注了西方传教士、使节和商人对大运河的记述,通过比较中外旅行者对同一运河景观的不同描述,揭示了大运河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重要作用。

这些域外记述不仅提供了观察大运河的新视角,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在相遇时的相互认知与误解。作者通过对这些跨文化文本的细致分析,展示了西方旅行者如何带着自身的文化偏见和知识框架来理解大运河这一中国文明的伟大工程,他们的记述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想象与认知。这种双向的分析视角,使得大运河研究超越了单一国家的历史叙事,成为了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独特窗口。

尤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将域外文献与中国本土记述相对照,揭示了大运河在全球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大运河不仅是我国的内部交通干线,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纽带,更是近代中西力量对比变化的见证者。通过对这一全球史维度的开拓,作者将大运河研究从地方性知识提升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议题,展示了大运河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

## 结语:走向一种新的大运河史学

总体而言,《大运河上的旅行者》一书以其创新的研究视角、多元的分析维度和丰富的史料基础,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生动而深刻的大运河历史图景。该书不仅填补了大运河旅行史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理解大运河的新范式——将大运河视为一个流动的文化空间,一个多元社会力量交汇的场域,一个不断被旅行者的实践和书写所建构的符号系统。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它使大运河研究从单纯的功能性分析转向了文化理解,从静态的结构描述转向了动态的实践考察,从单一的地方性知识转向了跨区域的连通性研究。通过将旅行者置于大运河历史的中心,作者成功地还原了大运河作为生活空间和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使那些曾经行走于运河之上的历史人物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 风物之咏 归去之情

——元好问在聊城六年间的诗歌创作(下)

■ 朱明华

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逃至蔡州的金哀宗自缢身亡,金朝宣告灭亡。此后,蒙古军对鞑靼的金朝官员管控渐松。1235年3月,元好问移居冠氏县,开启了自由生活。聊城六年间,元好问创作了大量体现当地人文风貌的诗作。尤其是在冠氏县居住的四年间,他建房迁居,与友人雅集郊游,饮酒赋诗,留下了许多欢快、幽默的诗歌作品。

元好问将家乡正月初五“送穷节”的习俗与聊城当地“破五”习俗相结合,剪纸人作“穷鬼”,扎草船渡“穷鬼”,将纸人、草船与春节期间的垃圾一同送走,以求来年穷厄尽散。在1234年的正月初五这天,他写下了《送穷》一诗:“送君君去欲何之,暂去还来也不辞。但愧苦无相赠物,柳船轻似去年时。”他在诗中戏言,穷神送走还会复返,而已身贫寒,唯能以草船相赠,自嘲中透出对人生困境的无奈。

在聊城,元好问与神霄宫道士交友。他曾于道观中觅得古铜爵饮酒,赋诙谐之诗《觅神霄道士古铜爵》:“若非仅狄墓中来,应自杜康祠下得。古人我得酒之传,摸索饮器流涎。”于诗中戏言:这古铜爵,若不是从传说中发明酿酒的伏羲墓中出土,那想必是在酿酒始祖杜康的祠庙下被发掘所得。他说,自己摩挲着这饮酒器具,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元好问曾留宿聊城神霄北庵,借梦境抒怀,信手写下《宿神霄北庵梦中》:“素月流空散紫烟,座中人物半神仙。丽川往事浑如梦,信手题诗一泫然。”在诗中,他描绘了一幅清幽的月夜图景,恍若仙境,而座中之人也超凡脱俗。他梦见丽川亭,忆起汴京往事,如梦似幻,动情落笔,不禁潸然泪下。

1235年正月初九立春,元好问作《乙未正月九日立春》诗:“十度新正九出家,今年痴坐转堪嗟。一冬残雪不肯尽,连日苦寒殊未涯。重碧总夸燕市酒,小红谁记上林花?残魂零落今无几,乞与春风恼鬓华。”诗中描绘了冬去春来,残雪未消,连日苦寒的聊城景象,慨叹十年中已有九年漂泊异乡度岁。

1235年初春,诗人前往聊城三仙祠游玩,留下《三仙祠》一诗:“三仙祠下往来频,憔悴征衫满路尘。箫鼓未休寒食后,樵苏时见旧都人。吹残芳树红仍在,展放平田绿已匀。西北并州隔千里,几时还我故乡春。”诗中刻画祠前人流量,间遇汴京旧人,抒发了漂泊异乡感慨,期盼重返故园之春。但从诗中所流露出的“残花虽落,犹存新红;平野之上,绿苗勾勾”的意象里,似乎窥见了一丝生机。

在聊城六年间的两年间,元好问与原金朝大理寺官员周良老情谊深厚,作《赠周良老》一诗。诗中写道(节选):“于公斯狱多平反,高门大车在乃孙。我居聊城欲二载,喜见周旋醇而温。十年大理书天考,宜有报如于门。大儿书来问安否,兵饥不死天所存。”他盛赞周良老为官公正、家门和睦,欣喜留聊城二载得遇此醇厚长者。

1234年春,旧友徐威过聊城,元好问作《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其二云:“东南人物未雕雕,和气春风四座倾。但喜诗章多俊语,岂知谈笑得新名。二年阻绝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别后相思重回首,杏花樽酒记聊城。”乱世之中得与故友重逢,他以“杏花樽酒记聊城”表达内心的喜悦。他用明快的笔调,记录下乱世中的这一美好瞬间。

同年,又与旧友李彦深重逢于聊城,赋《喜彦深过聊城》:“围城十月鬼为邻,异县相逢白发新。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言诗匪藉功名薄,去国虞翻骨相屯。老眼天公只如此,穷途无用说悲辛。”诗人回顾汴京围城惨状,自悔未随金主南迁,羡慕友人得归故里,对往事今境感慨万千。

初居冠氏,元好问暂赁民房。后得蒙古军左副元帅、冠氏人赵天锡相助,得以自建新居。对于多年漂泊的他而言,拥有自己的住宅意义非凡,遂赋诗以记。然而,1235年冬建成的新居,次年六月因邻家失火遭焚毁,后又择址重建。

1235年冬新居落成,元好问感慨万千,作《学东坡移居八首》。他满怀欣喜地在其二诗中写道:“谁谓我屋小?十口得安居。”他说,房子虽小,但可以住下我这十口之家。并进一步介绍说,南窗下是孩子读书的地方,西边房间是仆人们休息的地方。他生活在这屋中,整天悠然自得。站起活动筋骨,躺下舒展身体,窗明几净,温暖如春,仿佛忘却了尘世的拘束。屋前有片空地,正好种植花草蔬菜。

移居冠氏县自建新居后,元好问还效仿东坡体创作有《鹧鸪天·效东坡体》(节选):“煮酒青梅人坐坐,姚家池馆宋家邻。楼中燕子能留客,陌上杨花也笑人。”字里行间洋溢着乔迁安居的喜悦。

1236年新居重建完成,元好问曾作《戏题新居二十韵》而自嘲:“南风一夕怪事发,突兀堵垣瓦半柱”“由来马队非讲肆,况与驽车通过路”“君问新居在何许,只去火余才数步”“就中此宅尤费手,官给工材半根掬”。他描述在建房过程中,一夜南风刮倒了半根栋梁;建房的地方原本是车马往来的道路,还与猪圈相邻;新居距离之前被火烧毁的房子废墟仅有几步之遥;建造这座宅子极为费心,官府只提供了一半的工材,另一半还需雇人操办。在诗的最后,他劝慰

自己“上下方比良易见,好恶且当随所遇”,认为自己如今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坏之事还是随遇而安吧。

据《元史·赵天锡传》记载,赵天锡,字受之,冠氏人。以功授冠氏令,后授蒙古军左副元帅兼同知大名路兵马总管事。元好问居冠氏期间,多得赵天锡救助,二人情谊深厚。1235年,赵母于冠氏紫微观出家,元好问撰记文;1238年,为其祖莹撰《冠氏赵侯先莹碑》;1240年赵天锡卒,元好问撰《千户赵侯神道碑铭》。

为感念赵氏父子助建新居,元好问在《戏题新居二十韵》的开篇便写道:“去冬作舍谁资助?县侯雅以平原故。但愧苦无相赠物,柳船轻似去年时。”生动地展现了赵天锡父子在新居建造中的关键作用,体现了他们的热心与周到。

1235年,元好问创作《寿赵受之》一诗为赵天锡祝寿:“山东诸将拥行台,共许元戎有雅怀。文字谁知祭征虏,威名人识李临淮。农郊荆棘连新麦,儒馆丹青映古槐。看取邦人祝君寿,五云多处是三台。”诗中,他借古代名将喻赵天锡之武略,以农田新麦与儒馆古槐的景象,衬其治下政通人和;又借百姓祝寿、祥云映三台之景,颂其德高望重,既传祝福,亦彰功绩。

元好问一生酷爱杏花,在现存一千三百余首诗中,专题咏杏花的诗就达二十七首,在其他诗中提及杏花的还有十余处。他曾多次赴冠氏纪子正杏园和赵庄杏园,赏花饮酒,留下七篇优美的诗作。

纪子正杏园在冠氏城西,每当杏花盛开之时,主人会广邀文人雅士,游赏宴饮唱和。元好问在《纪子正杏园燕集》中描绘了纪子正杏园的美景:“纪翁种杏城西隈,千株万株红艳开。今年寒食好天色,晓气都郁含芳津。”他将未绽杏花比作粉妆乳儿,半开杏花喻娇羞少女,盛开杏花拟艳丽贵妇。他还在诗中描写了宴集的盛况:“平阳一邑多诗豪,主人买酒邀众宾。”“开皇初年,置于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治信陶,隋开皇初年,隋开皇六年(586年)新馆陶地置冠氏县,故后世常用‘平阳’代指冠氏。诗中说,冠氏这个地方有很多能诗善文的才俊,纪子正置办了酒席邀请众多宾客相聚。”

他在《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其一》中赞叹赵庄杏园杏花盛开时的景象:“一树生红锦不如,乳儿粉抹紫襦褕。花中谁有张萱笔,画作官池百子图。”诗人将杏花比作绚丽的锦缎,又将其娇嫩之美与婴儿的肌肤相提并论,希望画家能用画笔将这杏花美景绘成一幅《百子图》。

或许是过于喜爱杏花了,以至于后来他将平阳美酒称作“杏园春”。他在《续平阳十爱》中写道:“我爱平阳酒,兵厨酿法新。百金难善价,一盃即醉人。色笑榴华重,香兼竹叶醇。为君留故事,唤作杏园春。”诗中提到的“兵厨酿酒”,指该酒为驻扎在冠氏县的蒙古军所酿造。这种酒以新法酿成,价格不菲。酒色鲜艳,如榴花;香气醇厚,似竹叶。诗人愿意将这美酒留下一段佳话,将其命名为“杏园春”。他在为邵和卿《醉归图》所作的题跋诗《跋邵和卿醉归图》中,也提到平阳美酒“杏园春”:“好着蹇驴驮我去,与君同醉杏园春。”

1238年农历八月初二,元好问告别了在聊城近六年的滞留生活,离开冠氏,北归故里。离别前夕,他创作了多首赠别诗,流露出浓浓的思归之情。

在《雨夜》一诗中,他写道:“梦里孤蓬雨打秋,茅斋元更小于舟。无钱正坐诗作客,识字重为时所仇。千里漫思黄鹄举,六年真作贾胡留。并州北望山无数,一夜砧声人白头。”“六年真作贾胡留”,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六年来如同古时来中国经商的胡人般滞留在聊城;“并州北望山无数”,并州是太原的别称,在这里代指他的家乡。整首诗将他迫切北归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北归前夕,好友韩德华从三百里外的东平赶到冠氏县为他送行。元好问为此创作《酬韩德华送归之作》,对韩德华冒着酷暑远道而来送行表达感激:“暑涂三百里,追送不惮远。”同时,他表示自己归乡之日已不远:“里门眼中见,归袖劳重挽。”家乡的门槛仿佛就在眼前,可友人的挽留,归途的衣袍也变得沉重起来。

元好问离开冠氏之时,写下《别冠氏诸人》:“东舍茶浑酒味新,西城红艳杏园春。衣冠会集今为盛,里社追随分更亲。分手共伤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贫。他时细数平原客,看到还乡第几人?”他回忆平日与乡邻相处的亲密场景,如东舍新茶与美酒,西城杏园的烂漫春光,以及众人的聚会,更添此刻与冠氏诸友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

元好问滞留聊城六年,虽处人生黯淡时期,却是其诗艺积淀升华的重要阶段。他创作的“丧乱诗”实录亡国惨象,饱含对金朝覆灭的痛惜哀叹,亦蕴含对国家命运、历史因果的深刻反思。定居冠氏后,诗风转趋平和旷达,咏风物人情、叙邻里友情、抒乡思家愁,皆情真意切、笔致多变,尽显其历经忧患却坚守内心的姿态。这一时期的百余首诗作,是极具价值的文化记忆,为了解金末元初聊城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脉络与地方印记提供了重要视角。